

高教前沿

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46 期)

南京邮电大学高教所编

2023 年 4 月 6 日

目 录

高教视点

- 地方高校如何把准新一轮审核评估着力点 - 1 -
- ChatGPT 对教育意味着什么 - 4 -
- 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 8 -
- 学部制改革，怎样才能达到初衷 - 12 -

调查研究

- 为承认而挣扎——社会科学研究发表的现状和未来 - 15 -

地方高校如何把准新一轮审核评估着力点

2022年10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做好“十四五”期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通知》，吹响了新一轮审核评估全面铺开与推进的集结号。就笔者所在团队前期进行的调研情况来看，部分地方高校对新一轮审核评估缺乏全面认识与深刻理解，存在认识与实践上的误区。

具体来看，误区主要表现为“三个比较关注，三个相对忽视”，即比较关注实践操作，相对忽视顶层设计；比较关注被动性的迎评创建，相对忽视主动性的自评自建；比较关注各阶段主要环节、具体工作的推进，相对忽视重点、难点、热点等着力点的把握。

在对新一轮审核评估推进着力点的理解把握上，一些高校还存在“不到位”现象，即对新一轮审核评估以评促强、指引高质量发展的导向性认识与谋划不到位；对高校“十四五”发展规划与新一轮审核评估同步同向的认识与部署不到位；对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新一轮审核评估指标体系深度融合的认识与落实不到位；对新一轮审核评估和办学定位落实、办学特色培育、质量文化建设的相互作用、内在关联的认识与推进不到位；对在审核评估推进中充分调动全员参与的同时，凸显评估领导核心团队作用的认识与把握不到位。

当前，广大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应当树立科学的评估观，正确处理好审核评估校内顶层设计的若干重要关系，精准把握推进新一轮审核评估的着力点。

一、坚持以评促强 聚焦高质量发展目标

新一轮审核评估明确提出了要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的评建16字新方针，明确新一轮审核评估承担着以评促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新使命。

这一新使命蕴含了通过审核评估引导高校聚焦以评促强目标，强价值、强内涵，提质增效，追求卓越，指向高质量发展，进而引导高校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蕴含了通过审核评估构建并强化不同类型高校的顶层设计体系、内涵建设体系、条件保障体系与质量保障体系，从而支撑我国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蕴含了审核评估是我国高校“五位一体”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质量保障体系、

评估体系都是高等教育高质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高校要通过以质图强落实以评促强，真正做强课程、专业、条件建设、资源配置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进而“做强学校”。同时，这一新使命还蕴含了审核评估助推与指向的高质量发展是指基于高校办学定位的高水平、有特色（或特色鲜明）、示范性、（世界、国内、省内、区域、地方）一流建设。

新一轮审核评估通过凸显并落实“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本科教育教学的核心地位”来保障高校高质量发展；弹性增设定量指标，提供常模服务，要求每所高校至少选择3个同类高校、标杆高校常模，引导地方高校对标省内外高水平示范性高校常模找准定位与差距，在对标常模中引导高校高质量发展；设置“卓越本科教育教学示范校”、推选“本科教育教学示范案例”，激励高校加强教育教学内涵建设，办出水平，办出特色；继续关注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师资和条件的保障度、质保体系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以“五个度”作为衡量本科教学质量的准则以及审核评估的基准和尺度。

地方高校应以新一轮审核评估为契机，对标评估指标体系和质量标准，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落实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主动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

二、坚持规划引领 确保与评估同步同向

审核评估既要审核高校办学类型及办学定位与“十四五”发展规划顶层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也要审核“十四五”发展规划在本科教育教学及相关工作中的落实情况，审核本科教育教学工作推进与“十四五”发展规划部署的契合度与一致性。

贯彻落实这一新要求，不应该只是要求在高校“十四五”发展规划文本中有新一轮审核评估的目标、任务与专门部署的相关内容，而是要求高校将审核评估的自评自建、迎评创建、整改落实等环节与“十四五”发展规划的谋篇布局、规划建设、落实落地同步，要求高校制定科学合理的新一轮审核评估实施意见、工作方案及专项行动计划并认真落实执行，要求高校既要注重顶层设计体系构建，又要注重将审核评估指标要素全面融入“十四五”发展总规划、专项规划及二级学院规划。

可以说，推进新一轮审核评估与落实“十四五”发展规划是目标同向、内容共通、任务并进的。

三、坚持立德树人 强调融入评估全过程

从“教学”到“教育教学”的名称之变，反映了新一轮审核评估在评估理念、范围、内容、要求等方面的变化，更加聚焦凸显了“两个根本”，即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是立德树人的成效。

新一轮审核评估方案通过定性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方式，将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比如，指标体系突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理念，在“教师队伍”中的第一个二级指标就是“师德师风”，在“学生发展”中的第一个二级指标就是“理想信念”；增设了“党的领导”“思政教育”等定性要求，增设了思政课专任教师与折合在校生数比例等“5项数据”定量标准落实情况，增设了教师、学生、教材选用等“红线”问题与能否及时发现并妥当处置的“负面清单”等切实举措。

新一轮审核评估方案强调把立德树人融入评估全过程、全方位，将立德树人的工作思路、基本要求、激励政策、保障措施融入评估指标体系设计，提示高校立德树人已成为硬指标，由比较抽象到可操作落实，由难评价、难考核到可评价、可考核。

四、坚持“一校一案” 突出办学特色评估

特色发展是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新一轮审核评估在方案设计上，倡导高校在同一类型定位下彰显自身特色，以特色求发展，以特色形成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引导高校正确认识学校办学特色不是指某个具体工作项目有特色，学校特色不是独立于评估指标体系的存在。

特色的指向更加明确与具体化，改变了以前对特色过于宽泛化的理解。特色应当融入审核评估的指标体系，融入本科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各个环节、各个要素。特色可以是指审核评估若干一级或二级指标甚至是审核重点的特色。

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特色与特色发展是新一轮审核评估的重要内容与审核重点。地方高校可以通过确定“特色可选项”、总结提炼特色示范案例，落实特色发展战略，实现差异化发展，在各自领域各展所长。

五、坚持质量为本 推进质量文化建设

新一轮审核评估方案对第一类评估高校首次明确要求“注重质量保障的文化机制，引导高校提升内部质量保障能力，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对其他类评估高校也首次提出要从“质量管理、质量改进、质量文化”三个二级指标支撑“质量保障”一级指标。当前，“质量文化建设”已成为与新一轮审核评估伴生的热点。

推进新一轮审核评估，培育、建设大学质量文化，要抓好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确立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理念，并使之成为全员的质保理念、质量自觉。坚持学生中心，将全体学生学习效果作为关注的焦点；确立成果导向，教学设计和目标实施保证学生取得相应的学习成果；坚持持续改进，从上一轮评估整改落实开始，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的“评价—反馈—改进”闭环，形成持续改进机制。二是构建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使之契合学校办学定位，成为校、政、行企、师生多元主体参与的，校、院、专业、课程多层次推进落实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三是提高质保体系运行有效度，引导高校建立质量保障的多元评价机制，重视质量保障体系自身的持续改进；建立教育教学自我审核评估的常态化长效机制。四是重视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改革，通过研究剖析与不断探索改进，持续解决以往质量评价分数整体性虚高、评价结果波动性大、评价效用未充分体现等问题，提高质量评价的区分度、稳定性、有效性，进一步强化评价的激励功能、引导功能。五是递进推进质量文化建设，引导高校质量保障工作关注重心由制度层面向文化层面转移。

新一轮审核评估与“十四五”规划落实、高质量发展推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特色发展战略实施、质量文化培育形成等方面密切关联。这些方面既是评估的热点、重点、难点与关键点，又共同构成推进新一轮审核评估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地方高校应把握评估机遇，把准主要着力点，扎实开展自建自评，构建质量保障机制，从而真正实现新一轮审核评估以评促强、推进高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愿景。

（作者：顾永安，黄文祥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3-01-30）

ChatGPT 对教育意味着什么

——代表委员热议人工智能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教师会被ChatGPT取代吗？”

“ChatGPT会导致学校里作弊盛行吗？”

2023年开年以来，ChatGPT成为最火热的话题之一。

作为一款生成式人工智能软件，ChatGPT可以根据议题完成包括回答问题，撰写论文、诗歌在内的多种工作。会写作业、写论文、写演讲稿……ChatGPT的确在很多领域表现出了非常强大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可能会给抄袭、作弊提供便利。

面对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教育界将面对何种挑战，又该如何应对？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这一话题引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议。

一、争论不休：“对手”还是“队友”

目前，已有学校或教育机构针对ChatGPT可能在教育中带来的连锁反应，给出了明确回应。比如已有多所公立学校宣布禁用ChatGPT，多家国内外期刊机构声明，暂不接受任何大型语言模型工具，也禁止将ChatGPT列为论文“合著者”。

对教育来说，ChatGPT到底是敌是友？这个讨论自ChatGPT诞生就被大家热议，一方担忧新技术会带来更多难题，另一方则对新技术带来的新教育教学格局充满期待。

目前ChatGPT处于哪个技术阶段？全国政协委员，知乎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周源说：“就像第一次看到飞机飞起来、汽车跑起来，一方面大家很兴奋，没见过；另一方面会担心汽车乱跑怎么办，会不会撞到人家里去，这其实很正常。新技术从取得突破到大规模民用，还会再经历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需要突破‘最后一公里’的建设。但是我对技术创新一直是非常乐观的。”

人工智能应用对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此前“双减”政策中就提及要治理中小学生滥用“拍照搜题”这一现象。不少代表委员担心，盲目使用类似拍照搜题、ChatGPT等智能技术，会严重惰化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能力。

两会前，全国人大代表、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和同事做过关于ChatGPT的调研，在他看来，ChatGPT的出现是在长期基础研究基础上多学科交叉后的重大发展，但它仍然是现有知识的整合，并没有突破现有的知识框架和研究成果。至于它到底是敌是友，他打了个比方：“就像核能，如果利用得当就可以作为能源造福人类；如果不正确使用，就会给全人类造成灾难。”

也有不少的代表委员和专家认为，不妨让ChatGPT“多飞一会儿”。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张进宝认为，就教育系统中某些特殊和具体的应用情形，由于ChatGPT的使用引发的不良反应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即使是前述报道中所提到的行为，在他看来也只是短期阶段学生们的新奇尝试，很难说会变成一种长期行为，管理部门出台限制措施还为时尚早。而对于中国而言，该软件的使用所能引起的不良后果也尚未显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永谋说：“一些人夸大它的颠覆性，另一些人则低估它的冲击，这两种极端观点都应该避免。”

当然，我们也应该给ChatGPT一个自辩的机会，当记者在ChatGPT的对话框中输入“如何看待ChatGPT对教育的影响？”后，ChatGPT的回答是：“作为一个大型语言模型，ChatGPT可以对教育产生积极影响。提供在线学习资源：ChatGPT可以提供在线学习资源，并与学生进行对话。这种交互方式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好的支持和指导。支持学生自主学习：ChatGPT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提供学习材料和建议，帮助学生更好地自主学习。这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改善教学方式：ChatGPT可以为教师提供工具和资源，帮助他们改善教学方式。例如，ChatGPT可以提供自动评分、语音识别等功能，帮助教师更好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口语表达能力。”

二、针对教育：“逼入角落”还是“打开天窗”

“ChatGPT把教育逼到了墙角！”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对ChatGPT的判断。

对于目前ChatGPT带来的副作用，倪闽景表示：“教育会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比如学生会用这个找答案，甚至直接用这个写论文。我们教育有一些惯性，新的东西出来会比较手忙脚乱，甚至有些学校会屏蔽，这都可以理解，但我认为新的技术出来以后，需要的是更高层次的学习内容和新的思维能力的构建。”

在他看来，ChatGPT的出现，应该是教育自身改革的一次重大机会，因为如果传统的教育方式不改变，教育是不可能靠屏蔽ChatGPT维持下去的，只有多样化才能探索出教育新的生长点。

上海纽约大学名誉校长、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长三角教育发展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委员俞立中谈起ChatGPT引发的涟漪时说：“我们的教育改革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思维层面，花力气在教材、大纲、课程体系方面改革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培养模式、学校架构、教育形态要发生变化。”

倪闽景认为，面对挑战，教育改革需在以下三方面作重大调整。第一，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能独立思考和有正确价值判断能力的人，而不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第二，教育的方式方法需要有重大调整，主要的方向是要用ChatGPT等学习工具来协

同改进教育教学方式，而不是回避与恐惧。第三，教育要超越知识学习，更加关注学习的品质。

尽管大家对ChatGPT带来的变革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教育如何接招依旧需要妥善规划。刘永谋认为，在教育领域，ChatGPT在辅助学习、辅助教学和辅助科研方面的潜力初步显露，但也带来学术不端、冲击既有教育体系等问题。将ChatGPT运用于教育领域，不等于简单将其引入课堂和智慧教学平台，而是与教育理念更新、教育教学体系转变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教育数字化转型并非单纯的技术应用，必须预先研究、整体规划、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三、破解困局：“顺势而为”还是“关进笼子”

事实上，ChatGPT远没有大家认为的那样“聪明绝伦”。比如，ChatGPT会非常自然地回答诸如“诸葛亮是如何打败秦始皇？”这样的问题，并给出错误且荒谬的答案。目前的ChatGPT仍然难以充分理解信息和分析信息内在的逻辑关系，这样的事实性错误也会误导学生。

不仅如此，不少代表委员也关注到ChatGPT有可能会带来的风险。2022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将人工智能作为需要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重点领域之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伦理治理仍面临诸如存在知识产权侵权、生成虚假信息、算法“黑箱”、隐私泄露等争议。以教育数据隐私问题为例，ChatGPT需要联网工作，存在隐私泄露和侵权的风险。教育数据如果被滥用，可能伤害未成年学生。

在薛其坤看来，人工智能会涉及伦理道德、知识产权和学术不端等问题，下一步需要认真研究怎么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人才培养，教育部门应该在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同样的，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新技术的出现也有可能扩大教育不公平。刘永谋说：“不同地区的网络质量、设备配置水平等参差不齐，教师的数字素养差别很大，学生获得智能技术教育红利的能力存在地区差别。目前，关注ChatGPT冲击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可能造成新的地区教育数字鸿沟问题。”

在今年两会上，民进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伦理治理的提案》。当前，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伦理治理仍面临不少问题。在制度方面，可落地实施的法

律法规比较欠缺，合规底线和惩戒力度不够明确。在管理方面，缺乏统筹的问题比较突出，职责分工不够明确，伦理治理审查与监管仍存在空白。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认为，对于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浪潮，既不能过于担心、一禁了之，也不能毫不担心、放之任之，建议积极稳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等教育。

刘永谋认为，对于教育数字化的推动，应采取渐进且可持续的方式。数字化并非促进教育变革的唯一手段，更不是教育变革的全部内容。应用智能技术并非总是推动教育进步。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分步骤、分阶段推进，在运行中及时听取各方意见，不断调整、修正甚至重构推进方案。学生使用ChatGPT写作业和论文等问题，相信经过针对性调整后，会很快得到解决。

（作者：刘博智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3-03-05）

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代表委员热议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深入实施‘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建设288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接续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对高等教育过去五年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今年的政府工作提出建议，推进高等教育创新。

回顾过去五年，我国高等教育在体系建设、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国家创新发展能力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接下来，高等教育将如何继续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要从何处着手？代表委员对此展开热议。

一、优化建设布局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山西省委副主委、山西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院长双少敏：

当前，我国东部地区高校和中西部地区高校在教育经费投入、高水平大学分布、师资队伍建设、创新能力等方面均存在差距。对此，我提议，调整优化区域高等教育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中西部高等教育体系。大力支持中西部高校立足学科区域特色和优势，加快科技创新基地、新型研发机构及新型重点研发等平台建设，不断提

高学科建设水平。增强中西部高等教育支持政策的精准性，推动中西部高校内涵式发展，有效激发中西部高等教育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深入推进新一轮中西部高校“双一流”建设。以“双一流”建设学科为牵引，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构建学科群，引领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优势学科建设、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高端人才引进、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加大对“双一流”高校支持力度，强力推动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大对中西部特色高校支持力度，争取更多高校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

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特聘院长崔田：

目前，区域、城市之间的高等教育差距较大，高等教育在部分地区的集群化发展，对办学资源和高层次人才产生虹吸效应，进一步扩大了高校、地区间的学科发展差距，导致高等教育、科研机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高等教育的高水平普及要兼顾公平和效率，进一步优化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布局，中央财政要引导支持地方政府加强该地区高校的一流学科建设，产生一批对区域经济等领域发展支撑有力的特色优势学科。建立学科带动和促进机制。此外，对一些高等教育薄弱区域的地方“双一流”建设高校建立“特区”制度，在一流建设学科遴选和评价中适度向地方高校倾斜，在学科经费、引才津贴、人事政策、招生指标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可以考虑区分层次对“双一流”建设高校实行分类考核。

二、用好“指挥棒” 推进高校教育多元评价改革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

“破五唯”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高校有关评价指标体系，引导和激励各类高校在不同领域各展所长。一是要针对高校实际，建立“重创新、比贡献、讲质量”的分类、分层的多元评价机制。二是要强调国家需求导向的办学目标，并落实在评价指标设置中。评价指标应注重考查学校发展特色，推动学术、学科、学人建设与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把服务于“四个面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三是要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加强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建设。引入第三方机构对高校办学水平做出评价，提供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评价报告，引导高校建立与分类评价相适应的自我评价体系，以发挥评估对高校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破唯”与“增维”并举，增强与教育部学科评估、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等其他评价体系的衔接。

其次，还要重视市场导向在高校特色和分类发展中的作用，改变评估结果与资源分配的单向传导。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师范大学校长袁雯：

现有数字化教育体系缺乏规范化管理和相应评价体系。传统学习成果评价体系已无法满足“泛在可学”的学习者的需求。国内、国际开放性教育资源涌现，亟需配套多元评价体系。

在人才急需领域，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提级改造急需的交叉复合型人才领域，探索基于数字化课程单元学习认证的开放文凭和共同文凭制度。更大力度地鼓励国内高校开放优质课程资源，在规范前提下用好国外优质开放教育资源，不断完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共同促进学习型大国教育新生态的发展。

三、瞄准科技前沿布局 加强原始创新攻关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

城市是大学的后盾，大学是城市和产业发展的引擎。上海交大以承担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改革试点作为契机，依托“大零号湾”，用两个“一公里”把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贯通起来。

首先，推动跑好开头的“第一公里”，从平台战略布局和行动计划上，上海交大坚持战略导向与自由探索相结合，不断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前沿科学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来加强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的攻关。另一方面，做好重大前瞻布局，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利用学科的综合优势，持续推进“大海洋”“大健康”“大信息”等专项行动，同时瞄准科技前沿，致力于产出具有前瞻性、颠覆性的原始创新。

其次，打通“最后一公里”。从机制和支撑保障方面，以体制机制的优化和人才培养改革作为切入点，多措并举，致力于消除制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细绳子”。加强针对成果转化服务的晋升支撑保障，为人才未来发展设立通道。

全国政协委员、扬州大学副校长龚卫娟：

瞄准科技创新的关键技术和关键环节，提升前沿学科布局的针对性和精准性，避免单纯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看待学科布局问题，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逐步探索建立互利共赢的联动机制。通过资金流、知识流、人才流的有机融合，打造推

动学科发展的联合研发平台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综合运用行政管理、财政政策、社会支持等多种政策工具，促进学科布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要在前沿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学科布局中建立独特的竞争优势，体现出国家战略布局的总体需要和竞争发展需要，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避免“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布局。另一方面，要促进高校学科布局的分类管理机制优化，以重点关键技术攻克为突破口，迅速占领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制高点，促进不同类型高校和不同类型学科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和个性化。

四、创新育人模式 贯通人才培养渠道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国际处主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后备人才培养中心主任李鸿彬：

聚焦拔尖创新后备人才的培养，探寻构建选才育才的中国模式、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我认为，拔尖创新后备人才的培养不能只靠个别学校、个别地区的零星探索，要面向全国、面向全体学生开展拔尖创新人才“早发现、早培养”的实践探索，并建立层层选拔、集中培养的有效机制。

在拔尖创新后备人才的“早”发现上要加强研究，建立一套科学的，对于人才早期思维、行为特征的甄别方法和评价体系。在立法层面确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合法性，确立拔尖创新人才包括后备人才的培养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同时，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茁壮成长建立良好的通道，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贯通培养的渠道，并重视拔尖创新后备人才“拔长板”和“补短板”的关系，对他们的兴趣与特长，要尽可能创造条件挖掘潜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成长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委、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

“强基计划”启动实施以来，试点高校由最初的36所扩展到39所，录取学生1.8万余人。各高校选拔了一批对基础学科研究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优秀学生。同时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小班化、导师制，探索本硕博衔接的培养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方面，要突出学生志趣，提升选材精准度，将强基计划试点高校延伸至高中甚至初中，建立生源基地，开设先修课程，让中学生提前了解和适应大学的教学内容，让真正热爱基础学科的学生更早明晰方向，引导学生明确并坚定基础学科研究

志向。同时，注重保护学生个性，形成特色培养模式，建立适应人才成长的宽容多元的评价机制，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贯通以本研衔接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保障基础学科长周期培养。另一方面，国家应重点加大对中西部试点高校强基计划招生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面向中西部地区基础研究实际或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结合高校优势提前布局相关招生专业，为区域发展培养人才、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张欣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3-03-07）

在实施“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新一轮大学学部制改革再次开启—— 学部制改革，怎样才能达到初衷

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接续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在“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一个改革方向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多所高校相继成立学部，进行学部制改革：2022年底，太原理工大学正式成立理学部、信息与电气学部、材料与化工学部等八大学部，山东财经大学成立信息学部，中山大学成立经济与管理学部、医学部。加之稍前的南昌航空大学成立航空宇航学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艺术学部，大连理工大学成立医学部……学部制改革迎来又一个高潮。

成立学部，并非新鲜事。1999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四个学部学术委员会，2000年成立北大医学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40余所“双一流”高校设置了学部。

高校纷纷成立学部，进行学部制改革，意味着什么？

一、学部制改革，改变了什么

学部制是指在学校和学院之间设置一个“学部”层级，由此构成“校一部一院（系所）”开放式学科群的基层学术组织结构。

从“校一院一系”到“校一部一院”，学部制改革改变了什么？

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首个学部“地理学部”。学部以一级学科为单元组织编制学科建设规划。学部与各院行政负责人均取消行政级别并成立了学术委员会以及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委员会、师资队伍建设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

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成立。校领导曾在讲话中表示：启动学部制改革旨在完善学校管理架构，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黄忠敬看来，成立教育学部，改变是多重的一——权力重心下移，增强专业权利，激发学术活力。学校把专业权交给学部，比如，教师职称评审权，以前在学校评审委员会，现在下放到学部高评委，学部获得了终评的权力。与此类似的还有学位评审、导师资格评审、学位点评审等。

在学部层面建立大类通识基础课程体系，形成“三三制”课程结构，即学校课程三分之一、学部课程三分之一、院系课程三分之一。加强了学部层面的大类课程建设，尤其是学位基础课程和方法类课程。

整合学术资源、学科资源和平台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再面面俱到，或固守一隅，而是削枝强干，集中力量进行攻关。整合院系资源，发挥各院系的特色优势。

“实行学部制后，学术权与行政权相对独立，专业权的重要作用得以凸显。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组织，在学部发展规划、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忠敬认为。

2021年，我国新增的“交叉学科”成为第14个学科门类，学科交叉融合的新趋势进一步调动了各高校学部制改革的积极性。

“中国大学学部制改革正在经历不断深化的历程。改革的初衷是通过组织机构的调整优化学科布局，引导同质学科由分散走向集成、由竞争走向协同创新，服务于整合优质资源、集合学科群体优势、搭建跨学科创新平台、培养复合型人才与拔尖创新人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李芳表示，在实施“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新一轮大学学部制改革既是对国家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教育战略的时代回应，又是凸显学科优势的重要途径。

李芳认为，学部制改革构建了本学科领域“通识教育+专业教育”的育人模式，为学生提升学科素养、全面协调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学部制改革，在探索什么

“学部是学校学术管理的核心单元，有两种建立模式，一种是学科导向，一种是问题导向，趋势是两者结合。学科导向基于一个学科或多个相似学科进行聚类；问题导向从解决前沿具体问题出发，通过跨学科协同构建学部体系。”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部长王红介绍，“学部可以划分为两大类：行政性组织和学术性组织。从运营角度来说包括三种类型：实体型，设有党委与行政机构，统一管理；虚

体型，院系各自独立，学部主要进行学术管理，实行委员会决策制度；实虚结合型，学部统管，学院协管，学部对所辖院系的学术工作进行统筹协调，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

2018年，华南师范大学为了“实现教师教育强特色”，在全国率先成立教师教育学部。王红告诉记者，“在设立学部之前，请全国的权威专家进行了研究论证。成立学部以后，除了职前师范专业相关学科建设以外，还创设了全国第一个以教师培训专门人才培养为目标的二级学科，实现了学科建设层面的职前职后一体化。”

王红认为，学部成立充分体现出体制机制改革的特点，学部的建设对整合学科资源、推动教师教育特色发展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

“进行学部制改革是构建和完善高校学术治理体系的一种新尝试。在探索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进而寻求更加有效的学术治理，这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端鸿表示。

“学部制改革以学科交叉融合为核心，强调基层学术组织的有效运转。”李芳认为，学部应成为学科发展的规划者、所属院系及交叉平台的协调者、重大攻关项目的统筹者、教师队伍的培育者。

李芳直言，回顾我国大学学部制的改革历程，必须正视学部职能定位不清、“校一部一院”内部治理关系不顺、管理层级与管理成本增加、学院重组激化利益冲突、学科壁垒尚未打破、学科交叉动力不足等现实问题。究其原因，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大学内部治理关键机制配套不到位，导致学部按照传统学院管理模式运转，并由于利益分配激发二者矛盾。

三、学部制改革，应避免什么

“学部制改革进行到何种程度植根于本校发展实际、内部治理的格局、利益相关者的共识程度，因此不可能一哄而起，改革必然是不同步的。”张端鸿表示。

打破学科分类过细、分布过散的组织结构，以学科群和学科门类为依据实质性整合学科资源，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新一轮大学学部制改革的方向。“而抓住权力分配、资源配置、人力资源调动的关键制度创新，系统性调整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是激发学部自下而上发挥基层智慧的关键。”李芳告诉记者，学科建设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学部制改革必须以知识、专业技能、学术为取向，不能将相近学科强行组合在一起或凭空拼凑交叉学科。

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学部形同虚设，出现形式上整合了、实际上各自为政的情况。黄忠敬认为，这需要改革评价方式，由以前的注重个人绩效评价，转向注重团队协作评价；从数量式评价，转向注重原创性和贡献的评价；由注重科研式的评价，转向科研与教学并重的评价。

也有教师认为，同一学部的教师学科边界意识仍较强，参与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内驱力并不强，究其根源，评价机制的束缚是主要因素。

“学部要通过学科发展共同体机制优化学术资源配置，促进学术资源的流动和共享。”在李芳看来，学部应从内部发力，打破院系界限，改变学术资源封闭在单一院系的状态，促进学术资源在学部层面流动，并且争取学校层面的学术资源向交叉学科聚拢。

在学术资源整合机制上应倡导由集中走向共享。李芳表示，应鼓励教师依据共同的学术兴趣、学科需求结成学术发展共同体，建立学术发展共同体的常态化运转机制，构建共同的愿景与目标，并以协同攻关、跨学科研究为抓手，将专业权威的学术资源在共同体中共享，促进教师间的合作、交流、分享，激活交叉平台、跨学科组织的学术活动。

“由学院到学部，名称的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科研能否取得成功，能否获得突破性成果，能否做出原创性的创新；是否有自由探索的氛围，有评价体系、福利待遇的支撑与保障。如果形成了这样的良性氛围，那么，科研人员就会专注于科技创新，教师就会专注于立德树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潘士远说。

（作者：靳晓燕 来源：《光明日报》 2023-03-07）

为承认而挣扎——社会科学研究发表的现状和未来

一、学术发表与三种承认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对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命题的挪用。黑格尔的这一命题来自费希特。费希特强调，人们建立自我意识的前提，是对别人的承认。“承认”意味着接受他者以他者自己的方式的存在。只有认可了他者作为平等的存在，自我的存在才能够被“唤起”。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在更经验的层面上论述了人们如何承认他人、确立自我意识的过程。他设想这是一个充满冲突的过程，但是

达成彼此间的互相承认又是结束人和人之间争斗的唯一保证。互相承认是建立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秩序的基础。这一想法对后来的政治哲学，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全球关于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的讨论，有奠基性的影响。冷战之后，“承认的政治”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题。“承认的政治”强调，对少数人群（妇女、移民、少数族裔和不同性取向者），主流社会不应该仅仅按主流的标准来包容、认可和帮助他们，而是要按少数人群自己存在的方式去尊重他们的存在。政治是一个不断为促进相互承认而斗争的过程。

现代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实现黑格尔式的承认的理想领域。在学术共同体中，学者们平等、开放、循环往复的交流。我们通过了解其他学者的独特的想法，发现我们自己的独特和进一步深化的路径。换句话说，我们通过认得别人，进而认得自己、认得多样的思考方式，最终更好地认得世界。在建立这个互相承认的过程中，写作和发表是必要的手段。写作使得我们的想法更加清晰，发表让学者们在更大的范围内互相承认。

但是，今天的大多数中青年学者，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关于学术发表的体验。现在的学术发表，是为了另外一种承认，即来自体制权威的认可。发表，不是为了陈述自己有限但是独到的见解，而是要向体制证明自己可以达到主流的要求，有模仿他人的能力。发表不是为了参与辩论、分析实际问题，而是为了保证自己在学术体制内的生存，为了维护这个体系。

这样的承认，或许可以称之为“阿尔都塞式的承认”。阿尔都塞提醒我们，承认是体系规训个体的手段。萨特和福柯等思想家进一步揭示了阿尔都塞式的承认背后的微妙机制。萨特认为，我们被承认的时候也就是被限制的时候。当我们被承认为是一个“合格学者”时，“合格学者”这个事先规定好了的角色也就限制了我们的行动和认知。福柯则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并不限制个人的自由，而是形塑觉得是自由的、得到承认的个体主体。对个体的承认，乃是现代“统治术”（governmentality）得以实施的前提。只有当一个人受到了体系的承认，他才成为现代权力体系的对象，才进入到现代权力关系中来。

“阿尔都塞式的承认”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影响到学者的身心健康。为承认而挣扎，背叛了二战后全世界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共识。二战后，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解放，让人们摆脱现行结构的制约而发挥他们的能动性。

学术劳动首先是学者们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体现。而现在的研究工作成为统治学者的力量。写作和发表成为任务压力，学者感到厌倦甚至痛恨。但是为了生计、为了维持体面的社会地位而咬牙坚持。学者们不觉得自己在发挥创造力，而是相反，要刻意遏制自由和发挥，以尽快尽多地按要求出“成果”。发表不是思考探索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思考探索之前就锁定的目标；思考的过程不是从材料里寻常新的想法，而是把材料组合成可以发表的样式。学者不能向别人甚至不能向自己说明，这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学术工作成为典型的“异化”劳动。

学术工作的异化问题，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国内学界的反思集中在对现行评价体制的批评上，特别是“行政主导”、“过度量化”、“以刊评文”、追求排名等做法。以教育部和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管理部门也反复强调改革的必要。比如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林主编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No.9（2011）》指出：“各种学术不端行为恰恰发生在论文发表环节。”但是目前的讨论，在以下三个方面似乎可以进一步展开：

（一）现有的批评和改革建议，仍然以西方成熟学术体系为参照，以和发达国家的接轨为出路。但是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移植了西方学术管理经验之后而出现的。更重要的是，学术工作的异化在西方也日益恶化，在某种程度上比华语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目前的讨论视评价体系为所有问题的症结，中国教育部2020年12月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也指出了评价体系中的种种问题。但是，希望通过对体制的休克式疗法解决所有问题，似不现实。假设我们在一夜之间取消现行的评价体系，学术研究会有大的改进吗？很少学者会对此有乐观的回答。

（三）学界的共识是，合适的替代性评价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那么，学者个人只能在抱怨中等待吗？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小的突破口？要改变导向、要“破”体系上的问题，必须要有具体行动上的“立”。

本文希望强调，学者个人在目前状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改变现状中可以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学者个体的积极参与，体制不可能持续。所以，在分析学术发表的现状时，我们需要引入在黑格尔式的和阿尔都塞式之外的第三种承认观，即“巴特勒（Judith Butler）式的承认”。巴特勒强调了个人表演

(performativity) 在追求承认中的重要性。巴特勒论证，世界上没有客观的、稳定的所谓“女性”和“男性”的区别，但是人们在意识中有“女性”、“男性”应该是什么样的意象，大家按照这个想象的标准，不断去表演。通过表演，个人向别人、也向自己验证自己是符合性别角色的，从而获得承认。表演是稍瞬即逝的，所以要永远不断地表演；表演和标准总是有差距，所以表演者需要不断反思和改进；表演不是机械的重复，每次表演中都有创新、有出轨的危险。为什么虚无缥缈的性别意象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因为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在表演，这些无数的表演都在强化性别意识。巴特勒解构了“性别”这个范畴，但是更指出了人们如何在建构特定的秩序。既然社会秩序离不开个体的参与，这也意味着，通过自觉自省，我们是完全可以一点一滴地改变现实的。像斯科特（James Scott）在《弱者的武器》里说的那样，要改变体系，我们不一定去正面攻击它，只要我们不积极追求它的承认，它演戏时我们不去看，这样的简单“不理”就可以对体系形成巨大和持续的挑战。

本文的重点不在学术评价体系，而是关注学术发表的集体行为逻辑，和促成这一逻辑的个体心态和策略。文章的目的不是再一次描述和批判学术制度，而是希望厘清学者心中的焦虑和矛盾，从而激发改进现实的动力、探讨从我们自己做起的具体路径。在下文，我将首先论述，当发表异化为追求承认的手段，它带来了新的对学术分工的看法和学者的自我认知。然后，我提出四点可以从我们自己做起的建议。我的这些思考，首先来自于作为一个研究者和书写者的挣扎经历。同时作为研究生导师、发表评审人、职业升等评议人，以及12家学刊编辑委员会成员（2020年，包括10家国际的，2家中国的），也让我从不同角度观察到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种种现状。

二、从“宽—细”的等级到“高一低”的等级

当前的社会科学至少面临着三组矛盾现象。（1）二十一世纪的传播和交流变得空前便利，但是作为传播的一部分的学术发表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发表成为高校年轻教师的重大工作压力。（2）期刊的电子化、论文数据库的推出，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题目进行精确的文献检索，这大大弱化了期刊作为一个实体平台的功能。很少学者会系统地跟进某个学刊上的文章。但是，学刊的地位越来越高。在特定的学刊上发表却变得越来越重要。（3）社会科学研究分工日益细化，题目越来越专，一个小组的专家就完全可以充分地评价某项研究的意义，但是非要在可见度高、综合性

的学刊上的发表，才算是获得了正式的认可。在中国，72.3%的“CSSCI来源期刊”上的发表物跨越了10个（含）以上的学科。这些学刊显然不能成为专业化研究的有效交流平台，而是展示成果的“窗口”。

导致这些矛盾现象的原因是明显的：学刊不再是同仁之间分享研究、互相学习的俱乐部，而是要对学者分出三六九等的淘汰赛。读者、编者和作者之间，不是自己人的关系。越是综合、越是可见度高、越是不能做细致交流的学刊，变得越重要，因为它们是用来摆显的剧场，不是切磋技艺的工坊。

为了交流的发表是要促进平等的辩论，为了承认的发表是要进行等级的分化。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纵向分化都是不合理的。在理想的工作状态下，我们也会对研究成果进行自觉不自觉地分等：有的工作是凝聚了更多劳动、做出了更大贡献的，有的研究做出了局部性的补充，价值相对有限的。但是我们需要区别两种等级，即“宽一细”的等级和“高一低”的等级。现在的问题是后一种等级取代了前一种。

所谓“宽一细”的等级，是指：高的高，是因为高的比低的更宽。高的涵盖了低的，低的为高的提供了基础。我们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论述、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哈贝马斯对公共性的设想“高”，是因为它们涵盖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把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给我们的思考提供了宽广的框架。具体的研究在宏大理论之“下”，是因为其涵盖面有限，专注于大框架中的某一侧面。但是具体研究的涵盖面和抽象程度的“低”，并不意味着其价值就低。如果没有这些具体研究为基础，宏大理论就沦为大而不当的夸夸其谈。具体的研究，正因为它被宏大理论涵盖，可以从内部对大的框架提出挑战。这样，高和低的关系不可分割的，高级不是作为对低级的对立而存在的。这个“宽一细”的等级关系，和Skinner对中国地区市场系统的描绘也颇为相似。在Skinner笔下，市场是一层套一层的：乡镇上面有区域，区域上面有全国。一个大的区域市场比一个乡镇的集市要“高”，但是区域市场和乡镇集市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人否认处于“低”位的乡村市场的价值。

我对这个“宽一细”等级的描述，显然是受杜蒙对所谓“等级人”的诠释的影响。杜蒙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讨论等级制时带入了整体观。他认为，在印度教里，高种姓和低种姓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从而构成整体。高和低是作为整体的不同部分而存在的。杜蒙认为，种姓制度和西方现代的差别，不在于平等与不平等，而在于是从个人出发，还是从社会整体出发。西方的出发点是个人，所以个体间的平等

才成为一个基本价值，个体间的不平等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印度的出发点是社会整体，不把整体还原成独立、平等的个体；个体间差异被认为是天然的，个体间的不平等不是关键，关键是社会整体是否和谐。杜蒙的解释显然带有东方主义的色彩。但是他关于从整体论的角度看分化，对我们构想合理的学术生态中的高低上下是有借鉴意义的。

在现代，整体观框架下的高低，变成了分立式的上下。这两种高低上下的关系，也可以用印度社会的例子来说明。Mysore Srinivas提出了印度社会1950年代之后“西化”和“梵化”并进的态势。一方面，印度在经济建设、物质设备、政治制度和意识上拥抱现代化，包括强调人人平等，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梵学化”，婆罗门的生活方式成为大家模仿追逐的对象。低种姓接受了平等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们不是要废除种姓制度，而是要变成和高级种姓一样。彼此不再是涵盖和被涵盖的关系。种姓关系变成了基于个体化的、对立的不平等。这一趋势在我自己1990年代末对南部印度的调查中更加明显。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种姓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更激发了低种姓模仿高种姓生活方式的欲望。嫁妆制度是一个关键。嫁妆原来是高种姓群体的风俗，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低种姓也严格执行。而底层没有实力支付高额嫁妆，模仿和攀比给他们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

今天的学术界似乎是一个全球化了的当代种姓制度。它不仅高下分明，而且高下对立。高的存在，是为了和低区分，而不是低的另一种呈现。低是残疾版的高，没有自己的价值。大家追求同一个模式，同一个标准。不管有没有条件都模仿“高端”样式。刚刚做了两个月调查的硕士生，也要和哈贝马斯、本雅明、韦伯、福柯“对话”。反过来，思想生态上的单一化更加强了等级的单线特征。年轻学者不全神贯注从自己所掌握的细节中看出问题，而孜孜以求如何给有限材料迅速戴上流行的帽子。

三、我们怎么办？

国内外的诸多论者都寄希望于加强“专业主义”——即通过学术的自主自律——来摆脱现在的困境。但是，在亚洲，学术专业化正是为承认而挣扎的背景。在中国大陆，“发表至上”、“非升即走”等做法，都是权威学者，特别是有留洋背景的学者，主动发起和积极推进的，都是为了促进专业化。而且，在学术高度专业和自主的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诸国，学术体制危机重重。在那里，大学中的

管理层迅速扩大、教授治校正在落空。专业化使学术研究在形式上“自主”（如本专业的事情只有本专业的人说了算），同时也使之变得孤立而脆弱，即过窄的专业化研究脱离广泛的社会实践，学者不能形成自己的立场，不能和更大的社会力量联合，日常工作变得功利化，没有能力抵制其他力量的左右，在行政化的压力下只能在抱怨中服从。所谓“学术共同体”，现在更像是狭隘封闭的专业利益群体。

专业主义提供的空间是有限的。我们需要重新把学术研究当作一项社会实践对待。学术研究直接关系到学者和社会的关系、学者和学者的关系、学者的长期战略和日常策略。任何实践都是具体的实践。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建立“一起展开”的小群体

对阿尔都塞式的承认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同事之间实质性的思想交流。一位青年学者告诉我，系里的同事发表一篇文章，其他同事们在微信圈里逐一鲜花和鼓掌，“排列整齐，完成一个仪式”。这个仪式背后，有多少是对这项研究的兴趣？有多少是真心的祝福？有多少是对自己发表太少太慢杂志排名太低的焦虑？我们几次能在走廊里听见同事这样聊天：“有个问题纠缠我两个月了，一直找不出线索来……”；“你上个礼拜说的那个疑惑里，其实有一个值得细化的假设……”；“你前天晚上的那个问题，一下子把我思路打通了！”

援用哈贝马斯的话，在当今的学术实践中，“系统”（体制）统治了“日常”（即可以用自然语言进行交流、辩论，从而形成意义、决策和行动的领域）。如何重构思想的“日常”？我们也许可以尝试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小圈子里的人不一定是学者，更不一定是同专业同方向的。建立小圈子的唯一标准是愿意思考和“聊得来”。所谓“聊得来”，就是能够进入彼此的思维过程。一个旁人听起来不可思议的观点，对于进入了这个思维过程的听众它是有生命的：有它的源起，有它的演化路径，有它潜在的走向。进入了你的思维过程的人，就可以和你一起呵护、引导这个想法。

社会科学研究是一个有机展开的过程。一个项目究竟需要多少时间、能够达到什么结果，很难事先计划。但是这样的展开不完全是一个自发过程，它需要持续高度投入的努力。有时候需要重复展开，即不断回到原点，让一个想法的胚胎按另一种方式发育。这需要群体的支持。小群体应该是我们一起展开的圈子。在共同的展开中，我们也就彼此承认。

（二）拿心说话，不以言断人

学界对现行学术评价体制的一个惯常的批评是“只看作品不看人”。这可能是指，评价体系不注意个体的差异性、不给学者自主。但是在为了承认的挣扎中，我们也看到一个明显的相反的趋势，即学术工作的人格化：发表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研究者。对研究工作的评价变成对人的评价。评价结果直接联系到研究者的工作状态、收入、人际关系和自我认知。这种学术评价的人格化的影响相当深远。甚至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想的也不仅仅是如何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思想动态，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对作者进行判断，和自己作比较——就像一个为流量焦虑的网红在看另一个直播网红那样。

人类学家Strathern在批评1980年代以来英国大学的“审计文化”时，强调审计文化把金融逻辑和道德逻辑联系在了一起。审计文化固然代表了金融的逻辑，但是它同时带来新的道德观和个人责任感。在这种价值观之下，不追求发表、不满足审计评价要求的学者，不仅被认为无能，而且被认为是不负责任，是失职甚至“失格”。为了承认的挣扎也带来了更微妙也更深刻的偏狭的个人化。研究者在工作中时刻虎视眈眈：这是“我”的材料、这是“我”的观点；同事和同事之间成了互相提防的关系。研究者要证明“我”是合格的、而究竟世界为什么需要我的研究则是次要的考虑。

我们需要对自己重新定位。研究者个体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的属性（“合格”还是“不合格”、“好”还是“坏”）。每个研究成果都是我们思考展开中的一个片段。这个成果是真实的自我的体现，但是不等于自我。这就像艺术家的创作。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个作品对艺术家进行评价——因为她的生命中还有很多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当艺术品诞生后，艺术品又会反过来影响艺术家对自己对世界对艺术的理解。创造性是创作者的关键属性，但是创造性不是完全内在于创作者的。创造性是分散的、互动的，即创造的灵感总是来自多个渠道，创造结果的呈现，特别是社会对创造成果的感知，都是多样的、在和其他主体的互动中而实现的。因此不同的创作者之间，创作者和受众之间，都是重迭的，你我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所谓“我”的成果，无非是我对众多思考者一同展开过程的某一重迭片刻的捕捉。

（三）小步慢走，创新是风格而不是目标

“学术的价值在于创新”，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似是而非。所谓“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是对人类科学探索的狭隘的误解。如果有人能够用古老的理论把现实情况讲清楚，同时赋予旧的理论以新的含义，这样的工作就有突破性的价值。相反，缺乏针对性的所谓新说法、新概念，往往给有效思考造成障碍。假装创新，累己害人。小步慢走，放下创新压力，尽量用日常语言把自己能够说清楚的问题说清楚，这就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创新是一种风格，一种冲动：希望超越稳定的知识、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在小步慢走中，一举一动——比如在对材料的整理上、在写作方式上、在合作方式上——都可以创新。创新可以给研究实践带来活力，带来多样的研究方法方式，但是创新本身不是目的，扎实的贡献才是目的。

（四）尝试新的发表和交流方式

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着挑战，但是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在中国，20世纪末以来大规模高校扩招，为社会科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新的听众。虽然他们的大多数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是他们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心、对社会问题分析的鉴别能力，不低于专业研究人员。社交媒体的发展，为我们发表研究成果带来全新的渠道。新闻界、艺术界和公益界热切希望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有启发的分析。而社会生活本身的迅速变化，也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和研究对象、读者保持紧密的联系，以跟进最新动态和大众心中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发表方式，也就成了新的发现问题、收集信息、深化分析的方式。这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和社会实践联系更加紧密有机，同时也会促进实质意义上的专业化。大众要求学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出系统的分析，他们不会容忍学者躲在专业名词背后，用复杂的表达重复常识。

（作者：项飙 来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4）